

中國政治思想史

呂振羽著

中國政治思想史

呂振羽 著

生活 讀書 新知
三 聯 書 店

中國政治思想史

呂振羽著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6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8·850×1168 1/32·20印張·5插頁·433,000字

一九四九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四版

一九五五年六月北京第四次印刷

印數：12,001—32,000 定價：(6) 2.38元

初 版 序

一

本書原係我所編中國政治思想史講義稿修改擴充而成的。在系統上和原來的講稿比較，雖沒有過多的改變，然已不僅有詳略的不同，而對於歷史上各派思想家所代表的階級立場，都有重新估定的，自不免有結構上的部分變更。

我原先並沒有打算把這部講稿整理出版，後由於許多朋友和同學的鼓勵，才提起我這種勇氣。本來，在沒有產生一部較系統而正確的中國社會通史前，無論中國政治史、軍事史、法制史、哲學史、文學史、藝術史、宗教史……各部門的研究，要那些對中國社會史（至少經濟史）沒有素養的學者去擔任，實無異“大海撈針”，難以摸索着條緒的。何況在時代悠久、文獻“浩如煙海”而又真偽並出的情況下，更將增加研究的困難，也是無可諱言的。我是研究過中國社會史的人，無論我的見解正確與否，總算曾找出了一個粗略系統。因之，在拙著中國社會史沒有完成前，提早整理中國政治思想史出版，供從事中國史各別部門研究者的參考，在批判地繼承民族文化遺產的課程下，給中國社會思想史的發展以初步的估計，以及從歷史上來給予時代以較系統的暗示，又是我的一種不可逃避的義務。

本書包括的時代，係從階級社會的殷代奴隸所有者時代開始，貫穿着封建制的全時期——初期封建制、專制主義的封建制時期，以至近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這一過渡的時期。我企圖對這長時期中社會思想的各流派，從其形成、發展、死亡的過程上，以及其相互對立鬥爭——作為各別階級的本質的對立和同一階級內部各階層的統一對立——的關係上，作系統的探究。不過關於近百年這一部分，我尊重出版者的意見，不包括在此次出版的這部分之內，擬另於短期內出版。這是我自己引為歉仄的，諒讀者必肯原諒。（補註：接近百年部分的稿子，已於一九三七年平津淪陷時被焚。）

我的編著體裁，根據我對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初步結論，首先把中國史全部過程劃分為各個階段，各個階段又劃分為其發展過程的各時期；從各個社會階段和時期的階級階層的構成上以及其相互關係的變化上去論究政治思想的各流派，又把每個流派中各思想家的思想，作為其自己的一個體系去論究。所以我的原意，是在學習剩餘價值學說史的精神去編著的，結果自不免“東施效顰”。（補註：本書原和我所編中國經濟史講義是姊妹篇，所以對歷史各階段時期的社會經濟及階級構成、階級關係和其變化，在這裏沒有詳論。在沒有覓得中國經濟史講義整理出版前，暫請讀者去參考拙著中國社會史綱。）

關於中國社會思想史這一部門的研究，前此已有些斷代或全部的著作，但馬克思主義者對這方面研究的歷史還很短，有些研究者雖企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而由於運用上的錯誤，沒能作出正確結論；資產階級學者的著作，由於其立場和方法論的關係，都未能得出較正確的結論，像梁啟超等人的作品，在當時曾有相當的進步意義，到今日却已成了落後的東西；那些由假馬克思主義觀點出發的托派漢奸作品，不獨由於其方法論的錯誤，而且由於其別有用意的卑

鄙陰謀，其作品便完全是反科學的有害的東西，不當作為學術研究來看的東西。所以到現在還沒有一部能比較令人滿意而符合時代需要的產品。然對於中國社會文化思想作一較正確的總估計，在工人階級領導的民族現實的實踐鬥爭上，在民族文化傳統之批判的繼承的要求上，又是一件不容緩的事情。這部拙著還不是以中國民族文化思想的全面考察為範圍，而只是其中的一個部門。其是否能獲得較多的同情，比較能符合時代的要求，那只好期待於事實的反響。

二

百年來，特別是近二十餘年來，中國思想界及其對民族文化思想的估計，適應於社會諸階級階層的存在及其相互關係，有着各種不同的立場和流派。

十月革命一聲砲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自五四運動起，成為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一個組成部分的馬克思主義文化思想運動，便成了中國文化思想運動的主潮。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於中國舊文化思想，自始就表現一種嚴肅的態度、正確的立場，自始就在應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徹底科學方法去加以估計。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不只反對過時的、死去的或行將死去的舊文化思想，而且要求批判地去繼承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即那些有現實意義的、有生命力的、積極的進步的東西，而加以發揚。五四運動時，李大釗的今和青春等論文，就開始表現了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認識民族文化思想的傾向。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在其機關雜誌中所發表的一些歷史論文，基本上便開始表現了對民族文化正確處理的方向。在革命失敗後，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在極困難極險惡的環境下，也努力進行了對民族文化思想的探討工作，雖只是個別的少數人在進行，成績也並不太大，然却

理出一個初步系統，也可見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民族文化何等重視！中共領袖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等天才著作，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具體情況相結合的模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革命具體環境具體鬥爭中的發展，豐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寶庫，保證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文化革命方面說，他不僅正確地估計了民族文化，提出批判地繼承民族文化優良傳統、創造民族新文化的方針和任務，而且把它貫徹到黨、政、軍、民各方面的實際行動中，至今在抗日民主根據地，已成為支配文化生活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形態的現實東西。由此可見，只有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才真正重視民族文化，才能科學地認識民族文化、繼承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因此，深入地展開對民族文化思想之史的研究，把研究的結果提供到實踐上去，對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是必要的課題。

三

中國民族哲學思想的傳統，是相當豐富的。世人常是這樣說：“日本民族沒有其自己的哲學，中國人却是富有哲學思想的民族。”這當然是不正確的。然中國民族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由於封建制所經過的時期分外久長，而產生了較高的封建主義文化，所以在封建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形勢一再得到緩和的基礎上，作為封建統治階級哲學的儒學和道學，都獲得一再反覆的發展與闡揚，佛學雖產生在印度，然而在中國始獲得其系統的較高的發展。可是無論何種哲學思想，雖然有由於其民族所處地理環境等關係所給予的特殊性，以及由於歷史傳襲等關係所給予的特殊性等基礎上，會給予其民族的意識形態如哲學等以特殊的色彩；但在其根源上，作為精神產品的哲學等東西，其本質却不是民族的，而是階級的。

過去儒家對歷史上各種社會思想流派的分野，一貫地分別爲所謂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陰陽家、雜家……等所謂九流百家，此外還有後來的佛家等等；這完全把社會思想存在之根據的階級內容隱蔽了，結果自然不能說明其本質。從五四運動開始，資產階級各派學者，應用不徹底的、虛偽的科學方法來研究中國思想史，最初從事這種研究的，在中國爲胡適、梁啓超、李石岑等，在日本有渡邊秀方等。但他們對社會思想流派的區分，完全承襲着儒家。從他們的成就來看，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在當時曾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注意，然而根本沒有觸着各派哲學思想的本質；而且在“上册”出版後，便不能繼續下去，無異宣告其實驗主義方法論的徹底失敗。梁啓超在形式論理學方面的素養上，還似乎比胡適高明些；他對“先秦思想”研究的著作，在當時也起了相當的作用，但也同樣沒有觸着“諸子”思想的本質。李石岑在實驗主義的階段，對中國哲學思想並沒有研究出一個系統來；在其逝世前的數年間，便開始拋棄實驗主義，企圖用歷史唯物主義去研究中國哲學史，這是一個值得欽佩的進步。渡邊秀方的中國倫理學史等書，却不但把中國社會思想各流派的本來面目隱蔽着，而又把它庸俗化了。雖然，在半殖民地文化支配下的中國學術界，宗主國學者的意見，却容易獲得人們重視，所以像渡邊那樣無價值的著作，也公然在中國流行。一九二七年以後，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化思想工作者和進步的學者，才試圖應用歷史唯物主義來從事這一課題的系統研究。然其中有些人在其主觀上雖也想應用歷史唯物主義，客觀上却沒能完成科學研究的任務；在他們，第一、由於其對中國社會史概念的模糊，自始便沒有從社會經濟構成及其變動的基礎上，以及社會階級構成階級關係和其力量對比變化的基礎上，去論究各派思想發生的根源和其本質，第二、他們應用的方法，自始就

表現經濟主義的傾向。他如陶希聖、李季、葉青之流爲着反對馬克思主義，便僞冒歷史唯物主義的招牌，來販運反歷史唯物主義的商品。所以陶希聖的中國政治思想史，不只表現概念上的極端模糊，且自始只從政治原因上去解說其所謂“政治思想”，並沒有半點“唯物辯證法”的氣味，只是半實驗主義化身的絕對唯心主義。而他正是企圖以此來麻痹青年的。李季的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基本上並不是什麼學術研究，而是應用假馬克思主義觀點來反對馬克思主義、來破壞革命。由假馬克思主義觀點出發的王宜昌的一些歷史論文，把中國民族文化曲說爲毫無生命力的殭屍，謂沒有外力的撞擊就不能有絲毫的進步性。這也不是什麼理論上的問題，而是他們在響應日本法西斯軍閥的對華侵略。葉青的胡適批判等，是應用假馬克思主義加假三民主義觀點寫成的，更不是什麼學術研究，而是其向日本法西斯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特務機關的陳情書；假馬克思主義，是他尋找主子的本錢，假三民主義觀點是他乞取主子錄用的荐書。所以他故意抹殺“五四”時期自由主義文化思想運動的進步性，故意曲解中國古代哲學，抬高保守的落後的封建思想，都不過是他迎合其特務機關主子的觀點之一種方式。

我在本書的基本出發點是：

哲學思想，雖能作用於社會經濟和政治，基本上却是被決定於社會經濟結構和政治形態，並與之相適應，隨着其發展變化而發展變化的。如作爲封建統治階級哲學的儒學、道學和佛學，在其各自的本質上，雖通過全封建時代都是相同的，然而隨着中國封建制度的長期過程，以及其在過程中之不斷的部分的質變，也同樣在起伏着、變化着。同時，由於其階級內部各階層間以至階層內部矛盾的存在，所以同是封建地主的哲學，而有儒學、道學和佛學的分別，在儒學、道學、佛學

各自的內部又有其流派的歧異；又由於各階層相互關係的變化，有時表現儒、道、佛三者的相互對立，有時表現三者的統一，有時表現儒、道思想的統一與佛學思想的對立。這不過是一方面的例子，即足表現歷史自身的生動性，不是機械般可以把握着的。

四

本書的出版，完全由我自己覆校過。但在時間的倉卒中，或仍不免有魯魚亥豕之訛。

當我寫本書的時候，承許多學術界先進朋友給了我不少指示和幫助，尤其是吳檢齋先生給我的幫助更多。又我的弟弟持平曾從自然科學方面說明光、音、電等的運動法則（完全符合唯物辯證法的法則——雖然持平並沒有學過唯物辯證法），貢獻我作為哲學原理的參考。又本書原稿大部分，承袁炎烈、李邦彥兩先生為我抄寫過，我應該向他們表示謝意。

一九二七，二，二八，著者自識

增訂版序

本書的初版稿，是一九三六年在南京匆忙中整理完成的，一九三七年由上海黎明書局出版，發行了五千冊；一九三九年在重慶，曾改訂了一次，由桂林文化供應社接受出版，到現在還沒見發行。

現又就初版在文字上略加增減，並改正了我自己所發現的一些錯誤看法。但自己仍感覺太草率。我胆敢把它付印，意在貢獻給讀者作為研究中國哲學史乃至中國社會思想史的一種參考資料；同時，拋磚引玉，我也可藉以獲取讀者的指教，以便重行刪訂。

一九四三，三，二一。呂振羽自序

增訂版再版代序*

—

辯證唯物主義指明：世界是統一的、物質的整體，在自然界中、社會中存在着共同的辯證法規律；自然現象的聯系與相互制約，是自然發展的規律性；社會生活現象的聯系與相互制約也不是偶然性的，而是社會發展的規律性。體現社會發展的規律性的科學就是歷史唯物主義。

偉大導師斯大林教導說：“究竟什麼是決定社會面貌，決定社會制度性質，決定社會由這一制度發展為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呢？”“這樣的力量……便是人們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謀得方式，便是社會生活和發展所必需的食品、衣服、靴鞋、住房、燃料和生產工具等等物質資料生產方式。”（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三年中文版，第一五一頁）而生產方式則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統一的體現，生產力又是其中最積極最革命的因素，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首先又是從生產工具的變化和發展上開始的。

• 這是我一九五一年四月在中共中央東北局政治理論教員講習班的講授提綱，由東北日報以論社會思想意識、我們偉大祖國的偉大文化遺產為題，陸續在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四日、十五日刊登過，又曾收集在史學研究論文集裏面，現略加節刪，以此文作為本書增訂版再版代序。又本書這次再版，承東北人民大學歷史系、語文系的韓元符、楊振聲、單慶麟諸先生為我全部校對了一遍，特向他們表示謝意。——著者

社會意識形態是爲生產方式、即社會經濟基礎所決定的。馬克思教導說：“物質生活底生產方式決定着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過程。並不是人們底意識決定人們底存在，恰巧相反，正是人們底社會存在決定人們底意識……隨着經濟基礎的變更，於是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中也就會或遲或速地發生變革。”（轉引自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三年中文版，第一六四——一六五頁）因此，在歷史上，什麼樣的生產方式，就有建築於其上面的什麼樣的上層建築：政治制度、法權、藝術、哲學、宗教、倫理等等。因此說：自然、物質世界是第一性的，思維、意識是第二性的；在社會現象上，社會物質生活是第一性的，它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是社會物質生活的客觀現實的反映、存在的反映。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同志在著名的哲學著作實踐論中，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論作了光輝的天才的發展。他教導說：

“馬克思主義者認爲人類的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決定其他一切活動的東西。人的認識，主要地依賴於物質的生產活動，逐漸地了解自然的現象、自然的性質、自然的規律性、人和自然的關係；而且經過生產活動，也在各種不同程度上逐漸地認識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關係。一切這些知識，離開生產活動是不能得到的。”

“人的社會實踐，不限於生產活動一種形式，還有多種其他的形式……其中，尤以各種形式的階級鬥爭，給予人的認識發展以深刻的影響。”

“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

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覆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第二版，第二八一、二八二、二九五頁）

從這裏，我們可以更深刻地體會到：由實踐而來的反映與認識的深刻性，“……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同上書，第二九五頁）的規律性，直接從事生產的人們對社會歷史的偉大創造作用，革命的階級對社會歷史的偉大創造作用，現代無產階級的先進作用和領導地位。那種輕視生產勞動、輕視革命階級的作用的思想，認為人類知識純由於天才者的發現、發明和“英雄造時勢”的唯心主義思想，是完全錯誤的、沒有根據的。歸根到底，歷史是勞動人民創造的、是勞動創造的，人類的一切知識也都是勞動創造的。

二

歷史唯物主義斷言：社會思想、意識依存於社會存在；而社會存在總是先行的，思想、意識的產生或變革常落後於社會存在。斯大林說道：“顯然，首先是外部條件發生變化，首先是物質發生變化，然後意識和其他精神現象才相應地發生變化，——觀念方面的發展落後於物質條件的發展。”（斯大林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三五二頁）他並指出科學社會主義還沒有發生時，資本主義已經存在了，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階級鬥爭已經發生了；社會主義觀念還沒有產生時，生產過程已經有了社會的性質。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存在以前，不能產生馬克思主義，當社會進入資本主義階段，無產階級還只作為一個“自在階級”，經過無數自發的鬥爭後，才產生馬克

思主義。當資本主義進入其垂死的帝國主義階段以及實現了一國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時期，馬克思主義才由列寧和斯大林發展成為帝國主義時期無產階級革命的學說、社會主義建設的學說。當中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過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戊戌運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直至五四運動以後，我們才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正如偉大導師列寧在其經典著作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所論述，俄國怎樣經過半世紀的辛苦閱歷，“才掙得了馬克思主義這個唯一正確的革命理論”，和“在這個異常堅固的理論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布爾什維主義”（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六九三——六九四頁）。我國從鴉片戰爭算起，整整經歷了八十年的辛苦閱歷，才掙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唯一正確的革命理論，才在這個異常堅固的理論基礎上產生出毛澤東思想，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當社會變革以後，舊社會的思想意識，總還是多多少少或久或暫的殘留着。這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的蘇聯、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的目前的我國，都可以看見這種情況。因此，在無產階級革命或由其領導的革命獲得勝利後，對人民羣衆以至無產者本身的教育和改造，便成了最重要的任務。列寧曾說過：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將要重新教育千百萬農民和小業主，幾十萬職員、官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來重新教育無產者自己……是一個最重要的任務。斯大林在關於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總結中也早就說過：“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底黨的最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展開在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精神下教育新的一代和重新教育舊的一代的工作。舊社會遺傳下來的舊的積習和習慣、傳統和成見是社會主義的最危險的敵人。它們，這些積習和傳統，束縛着千百萬勞動羣衆……”（斯大林全集，俄文本，第六卷，第二

四八頁)在人民民主專政的我國,毛澤東同志也不只一次地像列寧斯大林一樣的講過。因此,也就可以理解,我們黨和毛澤東同志為何把思想教育問題提得那樣高。

社會意識的產生和變革常落後於社會存在,却並不與馬克思主義的預見相矛盾。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及其他天才領袖,根據那些已經存在或至少已在形成過程中的物質條件,掌握客觀世界運動的規律,提出當前所能夠解決的任務,指明鬥爭方向和歷史前途。實踐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預見完全是科學的,是合乎客觀規律的。

但是,不能因為歸根到底社會意識為社會生活的經濟的、物質的條件所決定,就認為是被直接決定的,就否定觀念發展的相對獨立性及觀念的繼承性在社會意識發展中的意義,就否認其自己的發展規律。恩格斯說過:社會意識的每種形態,不論哲學、藝術、法權、道德等等,在每個時代都有一定的思想上的材料作為其先決條件,這種思想上的材料為其前一代所傳給的,而社會意識的每種形態則從這些材料出發。舉哲學為例:“在經濟上落後的國家,常能夠在哲學上起領導的作用;例如十八世紀法國對於英國(法國人就是立足在它的哲學上的),後來德國對於前兩者……”(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思想方法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四七頁)從另一方面說,今日帝國主義諸國家中,美國經濟超過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而美國的哲學、藝術、道德等等,却反而更加庸俗、頹廢、腐敗、反動和落後。所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不只承認人類偉大文化遺產的偉大作用,而且善於從那些先進思想的偉大觀念中,吸收有價值的東西。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又必須承認上層建築對社會經濟的積極作用,才能正確地理解;政治運動的反作用及其所具有的相對獨立性;才能正確地

理解：人類對歷史的能動的創造作用，革命階級和偉大人物偉大思想對社會前進的推進作用，反動階級和反動人物反動思想對社會前進的阻撓作用，這也就是上層建築對社會發展所起的加速或阻礙作用。否則，就不能正確理解像法西斯思想及其他反動思想的異乎尋常的巨大罪惡，像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英機、杜魯門、麥克阿瑟、艾森豪威爾、杜勒斯、蔣介石之流的異乎尋常的巨大罪惡以及帝國主義、國民黨一類反動集團的異乎尋常的巨大罪惡；反而會歸咎於社會規律，要歷史來替他們擔負罪責。因此就勢必輕視對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鬥爭，輕視對一切反動思想的鬥爭。同樣也就不能正確理解歷史上某些對社會前進及人民生活起過積極作用의思想和措施的進步性；馬克思列寧主義對全人類空前無比的光輝作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這些無比偉大的人物對整個人類社會的推進作用；中國革命為什麼在機會主義領導下遭受損失和失敗，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英明領導下就獲得今日這樣光輝的勝利，使我們祖國成為全世界最重要的政治的軍事的強國之一。因此，就勢必抹殺歷史，就勢必減低對領導的信賴，輕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對錯誤思想的批評、對羣衆的教育。由此就可以理解黨的正確領導的重要性、無產階級革命學說的重要性，學習這種學說並以之去教育羣衆的重要性；由此就可以理解在和真正的羣衆運動、真正的革命實踐密切聯系中形成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和中國革命運動、中國革命實踐密切聯系中形成的毛澤東思想之所以堅強有力，之所以給予我們以無限信心，之所以把我們引向勝利，它在每個時期都給予我們以確定的方向和獲得勝利的方針……對我們的勝利有着何等巨大的作用。但這並不是說，歷史不是勞動人民所創造，不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在我們的一部分知識分子中，自覺或不自覺的流行着一種觀點，